

碑林采英

雷树田 著



碑林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碑林采英

雷树田 著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碑 林 采 英

雷 树 田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1.5 印张 4 插页 22 千字

1986 年 11 月第 1 版 198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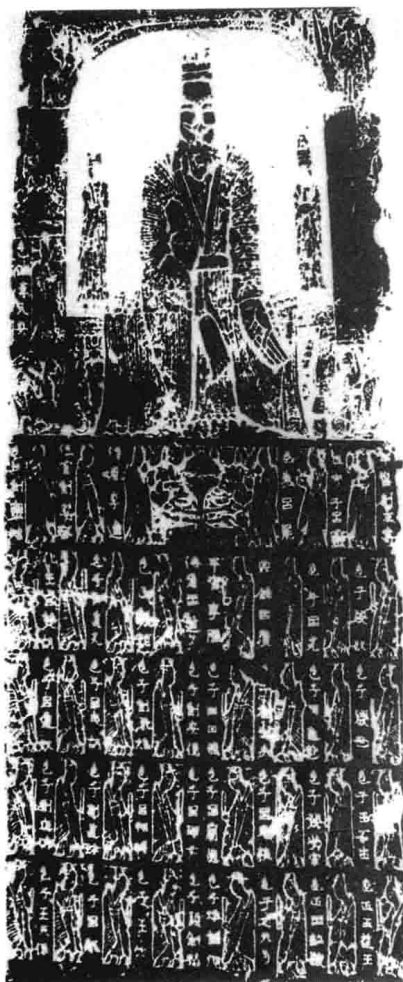
印数：1—6100

统一书号 10199·20 定价：0.60 元



秦·李斯《峯山碑》

位不副德君重
關是口鄉人爲
辟涼州常爲治
郎中拜西域戊
泉盛年諸貴和
潛隱家巷七丰
光



北魏 《邑子六十人造像》

魚袋裴休撰
柳公權書并篆額
子以扶世導俗出
為秦人初母張夫

羽翔龍師火帝鳥官人皇
始制文字乃服衣裳推位
讓國有虞陶唐吊民伐罪
周發殷湯坐朝問道垂拱
平章受脤稌首臣僕戎羌

唐《开成石经》

虞則王道成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

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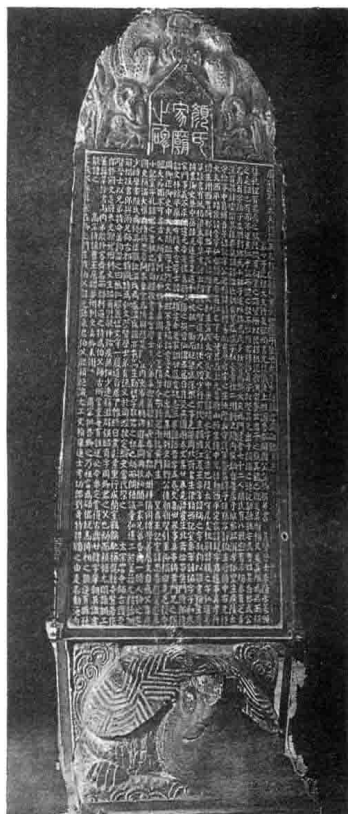
豝于嗟乎騶虞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

百七十七句

毛詩卷第一



唐·顏真卿《顏氏家廟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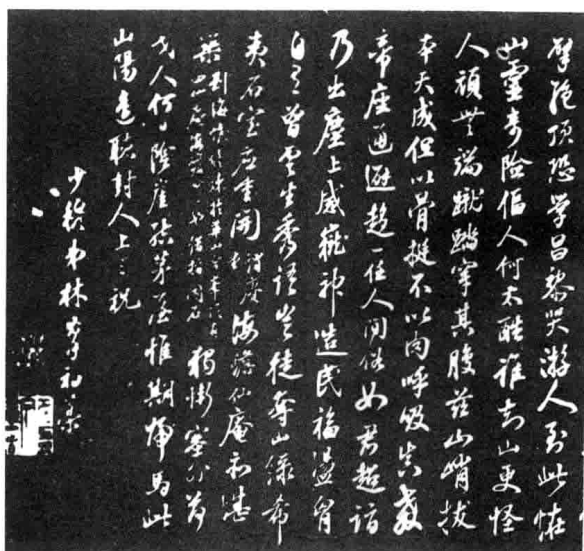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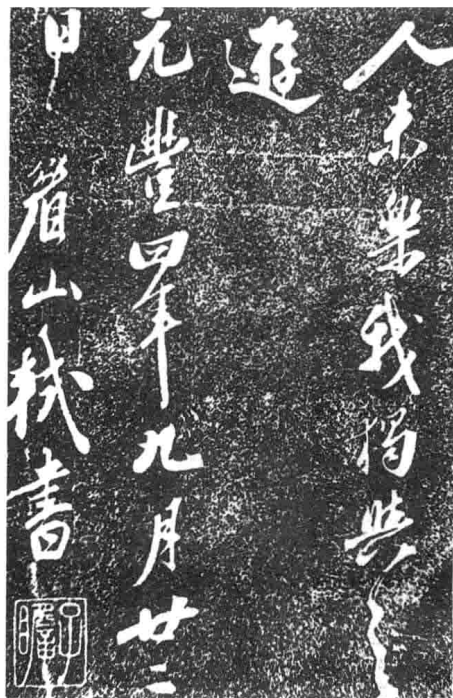
唐·顏真卿《多宝塔感應碑》

部負外郎琅邪顏真卿書
四依有禪師法号楚金姓
茹髡斷不為童遊道樹萌
髮住西京龍興寺衲僧錄
前釋迦分身遍滿空界行
以為輯莊嚴之因資爽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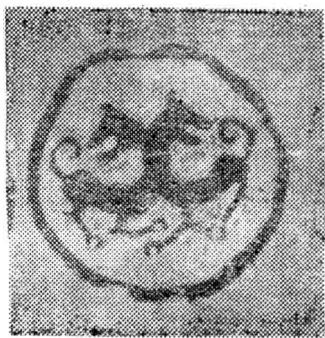
太宗文皇帝製
儀有家顯覆載
陰陽燮乎天地
神力而無下大

唐·褚遂良《大唐三藏聖教序碑》

宋·苏轼《归去来辞》



清·林则徐《游华山诗》



人们久仰古城西安，
也更加向往碑林！
那里有震动世界的历史名胜，
那里有古老文化艺术的无数奇珍……

西安，古代的长安，作为中华民族一个举世瞩目、名震遐迩的历史名城，对于国内外无数的旅人游客来说，确实具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我曾不至一次地听人们议论说，不少外国朋友到西安旅游后感叹道：“谁只到过新中国的首都北京而没有到过西安，那他还等于没有真正到过中国！”是的，作为中国古代“六大古都”（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杭

州)中建都历史最悠久,文物古迹最丰富的西安,被人们如此称赞是当之无愧的。然而亲爱的朋友,我还想补充一句:假如您是一个中国历史、文学、绘画、雕刻和书法艺术的爱好者的话,来到西安,没有参观西安碑林,也可以说您还不算真正到过西安呢!

西安“碑林”,碑石如林,这里保存着自汉魏至明清以来,十多个王朝遗留下来的与中国历史、文学、书法、绘画、雕刻等方面有重大价值的数千块珍贵碑石;通过对它们的借鉴,您不仅可以从中汲取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而且可以帮助您认识西安的过去,了解中国的发展。

每一个先进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一套保存文字艺术的方法。中华民族除了在甲骨、钟鼎、竹帛、纸张诸种物质材料上刻画、浇铸、书写自己的艺术品之外,远在先秦,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在石板上刻写文字的技术。据《事物纪原·碑碣》条记载:“无怀氏(古帝名)封泰山刻石纪功,秦汉以来始谓刻石曰‘碑’,盖因丧礼丰碑之制也。刻石当以无怀氏为始,而名为自秦汉也。”隋陆法言《切韵》又说:“碑碣李斯造,疑始于峯山之刻尔。”(公元

前二一九年，秦始皇巡游天下，登今山东邹县的峯山，命丞相李斯用小篆刻石纪功，人称《峯山碑》。《史记》未录其文，南唐时徐铉有摹本，宋代淳化四年，即公元九九三年，郑文宝据徐铉摹本重刻于长安，今存碑林第五展室。）唐陆龟蒙《丛书》曰：“碑，悲也。古者悬而窆（读biǎn，指下葬棺木），用木书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汉以降，生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称矣！此又德政有碑之起也。”可见中国碑碣的起源是很早的。本来大都是为了纪述君父或其他死者的功德而用之的，“西安碑林”中的相当一部分碑石均系这种“功德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扩大了碑石的用途——又将它用来刻写保存儒家的经典书籍，这样，所谓的“石经”就诞生了。

据史册记载，早在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一年），外戚王莽为了篡汉自立，大兴尊经崇圣的鬼把戏，曾命令甄丰“摹古文《易》、《书》、《诗》、《左传》于石”，这就是我国镌刻“石经”的开始。后来在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年），大书法家蔡邕又与五官

中郎将堂谿典等六人“奏求正六经文字”，得到汉灵帝的批准，“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乃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传》）两汉以后，又有魏正始（魏齐王曹芳年号）石经，唐开成（唐文宗李昂年号）石经，后蜀孟昶石经，北宋太宗石经，南宋高宗石经，清乾、嘉石经等。这种用碑石刻存古代文化典籍的办法，无疑也是我国古代人民群众的一个伟大的发明和天才的创造呢！

我们的祖先，历来十分珍惜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唐末五代时，为了保存唐代所刻的“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等，西安碑林开始了建置。唐昭宗天祐元年（公元九〇四年），黄巢起义军的叛徒朱温为了强迫昭宗迁都洛阳，对长安城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祐国军节度使韩建为了便于防守，改筑长安城时，将“石台孝经”从原长安城的务本坊国子监迁到唐皇城的西隅（即今西安社会路，宋代文庙所在地）。韩建改筑皇城时，却将“开成石经”等“委弃于野”。大约过了四五年，刘鄩来镇守长安，有

个幕僚名叫尹玉羽的，在征得了刘鄴的同意后，将“开成石经”运进城里，把它与“石台孝经”迁置在一起。到了北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一〇八七年），漕运大使吕大忠鉴于唐尚书省西隅（即宋代文庙）地势低洼，又近闹市，不利于对石经的保护，在他的倡议下，又将全部石经及其他碑石移置到京兆府学北面，即今天碑林所在地；并且修建了放置碑石的房屋、廊、亭等设施，排列了碑石的顺序，从而为西安碑林的建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记载：公元一二三一年和一二七七年，碑石曾两次全部跌倒，因此金、元两代对碑林屋宇等都曾进行过一些修理。到了明代，据赵子涵的《石墨镌华》说：嘉靖乙卯（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公元一五五五年），关中大地震，“开成石经”倒损四十块；万历十六年（明神宗年号，公元一五八八年），西安府学叶时荣、薛继愚，生员王尧典、马攀龙等又集唐石经字样，为缺损的石经补刻了大小九十七石，对那些由于长期拓印损磨不清，笔划走样的字，也按原字体进行了剡刻。清代康熙三年（公元一六六四年），陕西巡抚贾汉复补刻了《孟子》一书十七石；二十一年（公元

一六八二年）藩司麻尔图又刻了《大学》、《中庸》二石，从此儒家“四书”在碑林都有了碑石。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还有后来的吴大澂、端方等人，也对西安碑林做了不少贡献。特别是毕沅，主持修缮了碑林的全部房屋，使“前后堂庑，皆鼎新焉”，又“于土中搜得旧刻数十片，遂取石经及宋元以前者，编排甲乙，周以栏楯。明代及近人所刻，则汰存其佳者，别建三楹以存置。”（《关中金石记》）从此，西安碑林（又称“碑洞”、“墨洞”）的规模已相当可观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对西安碑林倍加重视。一九六一年，国务院即将它列为全国首批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之一。在彻底修整碑林的同时，对所有碑石进行了科学调整，并采取了各种有效的防护、保修、减蚀措施，增展了许多新出土的有价值的碑石和墓志，使西安碑林更加光彩焕发，引人注目，不仅成为陕西省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全国，乃至在全世界金石、书法、工艺美术等爱好者心目中，都成了“天下大观”之一。

现在的西安碑林真是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共有七座大型展室，六个碑廊和一座碑

亭，仅房屋占地面积就有二千八百八十多平方米；内中收藏有汉、魏、隋、唐、宋、元、明、清以及一些朝代翻刻的古碑、古画共二千三百余块。堪称是名副其实的碑石林立、精华荟萃、中外少有的碑刻艺术大宝库。

每当您走近悬挂着“碑林”匾额的红柱绿栏双层飞檐角碑亭时，都会看到有许多游客围绕着亭内竖立着的一座用铁条和玻璃板精心护持的长方体高大碑石在不住地拍照，也会使您向这块神秘的石碑靠拢！原来这就是久负盛名而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四十余年历史的“石台孝经”大方碑。这块碑由四石合成，碑文系隶书，字体雍容爽朗、端庄大方；碑冠上雕刻着的神龙，似乎蜿蜒飞舞在万里云海之中，碑座由线刻双狮和卷草纹饰的三层石台垒起，显得庄重魁伟，富丽堂皇，线条和谐，气象不凡。据讲解员同志说，这块“石台孝经”碑，是唐天宝四载（公元七四五年），玄宗皇帝李隆基亲自将他为《孝经》作的序和注释全文一并书石，交由“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监祭酒上柱国李齐古”等监造的。那么唐玄宗为什么偏偏在那个时候给《孝经》刻石造碑呢？说来也颇有意思的。

在中国古代，历朝帝王多以“忠”、“孝”论治天下。唐国公李渊是隋朝的臣子，利用农民起义之机，篡夺了隋朝的天下，算不得“忠”。因此从唐高祖和唐太宗开始，就将《孝经》做为治国之本，大加提倡。特别到了玄宗天宝四载，帝国发展到鼎盛转衰的阶段，不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日趋激化，就是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更激烈。玄宗为了进一步稳定他的“家天下”，不得不再度强调《孝经》中提倡的先王的“至德要道”——“孝悌”品德，以便达到“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政治目的，使他这个圣上至尊高枕无忧地去霸占一切、享受一切。这样，玄宗在天宝四载左右，一手大肆鼓吹“孝悌”，另一手又加紧了满足私欲的掠夺。例如天宝四载八月，他正式将儿子寿王李瑁（读 mèi）的妃子杨玉环夺过来，册封为自己的贵妃！“皇父天子”这样逆乱人伦的诸般不道不义的行为，却要臣民们以“孝悌”精神恭奉不违，岂非天大的笑话，尖锐的讽刺！自然，这并不能减低古代经典《孝经》本身的学术和德行教育价值。“石台孝经”从保存经典著作、反映盛唐文化水平、以及真实地再现历史人物